

世界富豪百传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韩国首富

〔美〕唐纳德·科克 著

郑周永传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富豪百传

韩国首富
——郑周永传

[美] 唐纳德·科克 著
唐杰书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前　　言

作为《芝加哥论坛报》的远东记者，我于 1972 年第一次来到韩国。但说到对韩国的了解，却不算陌生了。围绕着韩国的激进运动和骚乱活动（包括 1980 年的光州暴动和其他动乱）、1987 年和 1992 年的总统竞选、1986 年的亚运会和 1988 年的奥运会、北南关系和重大经济问题，我接触韩国至今已有 20 多年了。我报道韩国问题的经历秩序似乎有些奇怪，但是要知道，70 年代初期在韩国并没有那么多“重大的”经济问题要报道。当时，街上还没有现代产的小马、超优或奏鸣曲牌汽车奔跑，现代公司第一艘轮船的龙骨还没有在尾浦湾和东南海岸“现代城”蔚山大华河口的码头上矗立。韩国“奇迹”还处在蕴酿之中。

多年以后我才发现，韩国奇迹的创造过程，它的成就和失败，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外在显眼的激进暴乱运动、众人关注的南北和谈以及大做表面文章的民主化。韩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富有戏剧化的故事——有关一个人和他所创建的集团。这个人就是郑周永。他是韩国 90 年代初期政坛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他创建了所有韩国集团联合体中规模最庞大的现代集团。本书讲述的就是在韩国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背景下这个人和他的集团的故事。

作为一个言论封闭型的国家，按照官方的观点，韩国公众无权了解除了用于宣传以外的任何资讯，因此，要了解韩国商

人的私人秘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现代公司的上层管理人员对我非常友好，但他们不信任我，不愿向我透露集团的核心机密。无论怎么解释，他们对我的动机都充满了怀疑。在与我交谈时，他们要么文过饰非，大谈公司的光辉业绩，闭口不谈公司的挫折和失败，要么冠冕堂皇地说一些客套话。所以，我们需要集团以外的一些渠道的资讯，特别是在韩国和北美的现代企业里工作过的外国工程师和经理，来平衡对一家倍受争议和挫折的公司的看法。

在为写作本书而进行调查研究时，我经常被人问起：本书的写作是否有背景的，是否得到了现代的资助和某种支持。回答是很坚定的：不！写作本书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现代集团董事长郑世永及其侄子、郑永州的第六个儿子郑梦准都要我在本书出版前向他们交一份手稿，以防书本中出现什么错误。集团的公关部经理朴日光也提出了这一要求。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愿在书出版之前遭到被审查和删改的嫌疑。鉴于此，对于本书的所有观点及支持本书的观点的事实和引文，我负全部责任。

作者，1994年7月于汉城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儒学控制下的韩国财阀	(1)
一、现代神话	(1)
二、固执的总裁	(20)
三、神奇的儒教精神	(35)
四、现代精神	(50)
第二章 创建现代奇迹	(62)
一、成功的开端	(62)
二、伟大的建设基地	(76)
三、向沙漠进军	(91)
四、走出国门	(112)
五、新的冒险	(128)
第三章 曲折的汽车之路	(141)
一、钟情轿车	(141)
二、甜蜜的汽车岁月	(158)
三、沉重的打击	(173)
四、格格不入的韩国人	(190)
第四章 高科技的挑战	(213)
一、步入电子世界	(213)
二、在硅谷的执着追求	(225)
三、永无止境	(237)

四、无休止的竞争	(249)
第五章 罢工此起彼伏	(266)
一、绑架事件	(266)
二、突然袭击	(279)
三、暂时的和平	(291)
四、隐秘的圈套	(298)
五、决战	(308)
第六章 竞选总统	(328)
一、向政府挑战	(328)
二、家族亲情	(340)
三、在法律面前	(363)
四、屈服	(388)
后 记	(419)

第一章 儒学控制下的韩国财阀

一、现代神话

在传统儒家思想占主要地位的家族里，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郑氏家族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199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凌晨5点半，76岁高龄的韩国首富，总统候选人郑周永在他汉城的家里召开了一个家族聚会，出席者有他在世的六个儿子中的五个、一位已自杀了的儿子的妻子，再加上他30年前去世的一位兄弟的儿子。在场的每个人都身着黑色西服、白色衬衫，端坐在并不太舒适的藤条椅上，围着一张很小的桌子，匆忙地吃着由茶、新鲜水果和米饭组成的早餐。老人不紧不慢地夹了几筷子韩国人最爱吃的泡辣白菜，对于辛辣的食物，他并不是很喜欢。

在聚会上，郑周永也许会和大家聊聊生意，或者会谈谈政治。通常情况下，他的儿子、侄子和女婿们都会在一旁有礼貌地洗耳恭听。“通常说来，当你有许多长兄时，你不会说得多，”他八个儿子中的老七梦允说。八兄弟中，老大死于交通事故，老四已自杀身亡。“我们都话语不多。”显然，这更像一次训会，而不是一次恳谈会。楼下，他们温顺的妻子有的在啜饮茶水，有的在宽大的厨房里忙碌，耐心地等待着回家与孩子们共进早餐。很快，男人们起座离身，默默地走过在外面排

成一排、不停地朝老人点头的女人。老人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宽敞而简陋的两层楼水泥房。房子由六名身着衬衫宽裤的保安和六条大狗看护，位于一座小山的山脚，山上可以看到不远处冒出树梢顶的总统府蓝宫。

在他的儿子们、一位侄子和一位女婿——一名出色的神枪手、保安主管——以及三名保镖的陪同下，郑周永朝他设在通往国家博物馆大街上的办公大楼的政治总部走去。妻子们则开着黑色轿车，各自驶回散布在城里各个地区的豪华公寓和别墅。这种每日举行的仪式已有很长历史，因此，山坡上的邻居并不感到奇怪。在这个山坡上，郑周永能看到现代集团的总部，这是他在日本投降后一手创建的，现在已发展成了韩国最大的商业集团。

30年来，每天都有这样的仪式，一步步伴随着郑从在城里建立他工业帝国的第一个总部，开始街边汽车修理业务起，到现在建成一个世界性的轮船、集成电路、汽车、电脑、石油平台和桥梁建造的集团公司。每天凌晨3点，他就开始披灯阅读文件、打电话、接待来访者，两小时后，开始吃早饭。他孜孜不倦地工作，几十年始终如一。到现在，他的个人资产据他正式宣称已达到了40亿美元，有些人估计则达到了65亿美元。现在，他虽然因为要从政而已从公司“退休”，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工作日程表。“不去参加每日凌晨的聚会是不可想像的，”当被问到如果不出席早餐聚会会有什么后果时，六子梦准回答说。

偶尔，儿子们中也会有不准确守时的。有时候（当然，这样的时候并不多）也有人会缺席凌晨的这一朝拜仪式。对这种失礼行为的处罚也是极为严重的。一名仆人会给缺席儿子去电话，告诉他当晚去老父的寓所，并且整个礼拜都呆在那里，与父亲一起凌晨3点起床，当然，还得准时坐下来进早餐。“你

必须说清楚缺席的理由，”七子梦允解释说，“否则必定遭到父亲的训斥。”在一个薄雾笼罩的凌晨，我去他家，五子梦宪因故缺席。他正被囚禁在监狱里，因为他大量挪用了父亲给予他的公司的资金，投入到父亲的政治博奕战中。“他是一个政治事件的牺牲品，”忠心耿耿的梦允说，“如果我父亲不从政，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没有人进行过反叛或质疑——即使当郑周永颐指气使地安排他的财产和家族的未来，告诉儿子们，你做这个公司的主席，你做那个的主席时也是如此。“父亲说了算，”梦准说。他一直是郑周永最大公司之一的主席，直到老人要求他进入全国议会，去帮助他竞选总统。梦准对披露选举过程也同样很关心。（“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他告诉我，“你写到任何有关我同您谈到有关我家庭的事时，请转给我看看。”他请求道，并且不再说什么。）

难道没有人会问父亲为什么他要去这个公司，而不去那个公司吗？“这是个愚蠢的问题，”梦准回答说，“每个人的父母都要管他。”当被问到他父亲是否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对他很严厉时，他不太情愿地补充说。梦准并没有向他的妻子打招呼。他妻子金永明毕业于波士顿附近的魏斯理女子学院，是一位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的女儿。此时，她正匆匆忙忙地赶往他的轿车，嘴里一边嘟囔着：“我得送孩子上学去。”

与梦根一起慢慢散着步的梦允肯定了梦准的话。他说：“一切的一切，都由我父亲决定。”他把这种安排描绘成一种交易——你为我做这个，我为你做那个。因此，郑周永并不是仅仅靠压力将家庭组合在一起的，他的公司和政党也不仅仅靠外力聚合在一起。依梦允的说法，这是一种领袖魅力。他父亲的意志力中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因素，除了知道如何震摄住他业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外，他还有另外超强的能力。“我父亲对孩子

一直都很严厉。”梦允继续说，他竭力想找出父亲身上散发出的特殊权力，几乎有点唠叨了。

他对儿子们要求严厉，自己的私人生活中却有许多丑闻。这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与韩国的许多父亲（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不同，郑周永尽管要管孩子们的事业，却从来不强求孩子们的婚事。“郑主席并不要求他的儿子一定要娶名门闺秀，”郑的一位长期的忠诚助手李丙奎说，“他是一位很现代的人。他的思想很通情达理。他所有儿子的婚姻都不是经父母之言决定的。”梦准是在美国读书时与他的妻子相遇的。他的背景是儿媳妇中最显赫的。其他儿媳妇则大多来自商人家庭——富裕但并不显贵。唯一一位与显贵族族联姻的是淑永，郑世永的女儿，他是郑的弟弟，继任郑周永担任了集团的主席。她的公公曾任韩国的总理。

儿子们决不会在父亲仍然统治着家族集团时使他们兄弟间的竞争公开化的。“我知道，其他一些集团内部由于兄弟不和而产生了矛盾，”梦允说，对有关兄弟间权力之争的传闻置之一笑。“我并不认为我们之间有隔阂。”然而，如果不是出于父亲的影响力，兄弟们可能很难得见面。“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他说，并强调他们在午后要么会见面，要么会通电话。父子早餐聚会也许是韩国工业界统治家族中的一个特殊做法，但一往无前的动力、对老板不容置疑的服从、血缘间的忠诚却是现代韩国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后殖民社会崛起的征程中的共同特性。韩国从贫穷和战争的疮痍中摆脱出来以后，访问者常常问的一个问题便是韩国是否或者甚至何时会赶上直到二战前半个世纪一直占据它经济命脉的日本。

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一直存在这样的疑问：韩国能变为“新日本”吗？如果日本人能成功，为什么与它仅仅是日本海一水之隔的兄弟国家就不行呢？在从来没有将亚洲人加以清楚

区分的美国人看来，他们似乎都是一个模样。与典型的中部美国人的想法相比，韩国人显得更加小巧玲珑，但有着黑色头发、精于计算、进取心十足的韩国人立即表现出了他们“确实很像日本人”。他们的商品，从汽车到电脑，纷纷涌入美国市场。

美国三大主要商业杂志都发出了惊呼。“韩国人来了！”《商业周刊》在一篇全面介绍韩国1995年出口情况的封面文章中说。“韩国会是下一个日本吗？”该杂志发出了疑问。两年半后，这一问题仍然引起共鸣。1988年汉城奥运会召开前几个月，《福布斯》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韩国：它会超过日本吗？》的文章，在该期杂志华丽的封面上，画着一幅图，图中一头韩国虎跳出笼子，咆哮着，高举一只虎爪，虎爪下站着一位矮小的山姆大叔，一只手依着身穿和服、簌簌发抖的日本人的禿脑袋。4年后，1992年，《财富》杂志给出了答案。该杂志在一篇名为《韩国虎继续咆哮？》的封面文章中宣称，“南韩跃跃欲试，企图成为下一个日本”，杂志封面上有一张大字公司主席金宇中的照片，金满面笑容，手握一只老虎玩具。

超优是引发这一声势的最初原因。它是一种看起来非常漂亮、小巧的轿车，一推出就获得了成功。该车的制造商并非大宇汽车公司，当时该公司正与其合作伙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产生了激烈冲突，要结束合作关系。该车的制造商是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对大多数只把眼睛盯着日本名字的美国投资者来说，它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家公司就是现代汽车公司，其美国分销商是现代汽车美国公司。当第一辆超优轿车到达西海岸时，美国人对其还一无所知，麦迪逊大街一家著名的广告代理公司为了给广大的美国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创造了一句很押韵的广告词——“Hun day as in Sunday。”（意为“乘现代，度周末，惬意无比。”）但实际上，这句广告词中的两个词并不

押韵，因为 Hyundai 的发音读作“Hyun-deh”更合适。不过从商业角度看，这句广告词还是相当成功的。

与美国民众把“Hyundai”的发音读错相比，美国商业传媒的错误则难以原谅。因为 80 年代末期当现代超优轿车纷涌进入北美市场时，美国商业传媒还在鼓噪两大神话。第一大神话是，韩国人“赶上”他们外貌酷似的兄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只要稍懂历史的人就可以知道，历史其实并非如此。日本人并非在二战结束前 35 年才开始统治朝鲜。在这以前，日本人就已从经济上侵占了整个朝鲜半岛，而在此之前几个世纪中，日本人不断通过侵略战争，侵入朝鲜半岛，掠夺这儿的财富，同化朝鲜民族的文化。自从 1592 年韩国的李舜臣将军的“铁甲船”击败了日本舰队（直至今日仍是韩国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英雄时刻）以后，韩国人在军事上再也没有取得过重大胜利。

除了尊崇个人强韧，熟习武术，韩国人还奉行一套来自中国儒教的陈旧、过时的传统系统，尊权敬老，王公大臣每年都要举行祭孔大会。自从世宗大王在 1446 年颁发了韩国人独有的《语文》小册子以来，韩国知识界再也没有创建、设计或创造过什么独立的思想。韩国社会中存在一个“卑微的手工匠人阶层，他们的名字后面一般都要标上 Chaengi 二字，以表明他们地位的低下”，朴正熙写道。这位将军在他 60~70 年代将近 19 年的独裁统治中一直试图扭转这种情况。“这种对专业和技术人士的歧视态度对韩国的技术现代化构成了一个严重障碍”——这正是现代韩国缺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深层文化和历史原因。

在很多韩国学者看来，日本人的祖先是从朝鲜半岛移民过去的，从这儿带去了他们的文化，反过来又对其祖先进行抢劫和掠夺。但这种观点的基础是一些考古发现和民间传说。现代

韩国与现代日本在教育、经济和思想上都很相似，就犹如一支业余棒球队之与职业棒球联合会中的强队。其中的一些球手无疑会一时风光，但大多数人却不能达到同一个水平。

80年代美国商业传媒制造的关于韩国的第二大神话几乎与前者相反：这些雄心勃勃的韩国人经过姗姗来迟的工业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制造出了这些电视机、集成电路芯片和其他产品。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现代、三星、大宇或乐喜—金星这些韩国大商业集团的名字，他们很难想象遥远的“亚洲人”会有勇气、头脑和金钱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造起如此高精尖的企业。事实上，二战以后，目光远大、坚韧不屈的年轻人就努力在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真空中建立自己的公司。朝鲜战争造成的大灾难，为他们创造了空前的机会。

美国人给了韩国极大的恩惠。他使韩国摆脱了日本的统治，又用大量的资金和订单唤起了沉睡的韩国经济。但是，美国人也犯下过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在1945年的两次划时代的会议——先是在2月份的雅尔塔会议，继而是继4月份罗斯福总统去世后在7月份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中与他们二战中的盟友同意分裂朝鲜半岛。根据这两次和会的决议，朝鲜半岛实行有限度的托管，被过高估计的苏联军队得到了完全自由的权力，得到苏联红军支持的将领金日成，挺进到北纬38度线，以打击同样被过高估计的日本军队。韩国人对这两个和会的决议极为不信任。在他们心目中，美国人无论如何进行外交斡旋或事后工作，都无法弥补他们犯下的历史错误。

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其他15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打得朝鲜军队节节败退，一直挺进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并与进入朝鲜半岛的10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面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美国人自己也蒙羞败退，一直到南

部港口釜山的北边才稳住防线。最后中国军队退回到 38 度线以北，双方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尽管美国军队没能统一朝鲜半岛，但他们对南部的防务和重建工作中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促进了南韩的工业革命。因此，南韩历史中的美国时代既标志着日本殖民剥削的终结，也标志着与世隔绝的封闭时代的结束。19 世纪末，当成批西方传教士涌入朝鲜半岛时，他们把这儿称为“隐身王国”。

美国人带来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部分粉碎了原先阻碍工业创造和更新的僵化的阶级结构。但是日本统治时代灌输到朝鲜人思想中的儒家关于对权威的尊崇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宗教、经济和政治的动乱中，韩国式的儒家思想从殖民时代进入到了现代，虽然基督教在韩国日趋繁荣，到 90 年代据说有 1/3 人成了基督徒，但潜藏在思想深处的儒家价值体系对今天强大而咄咄逼人的韩国经济的崛起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超优汽车成功的意义，一般人的考虑似乎过于短浅了。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它源于一位来自后来成为——朝鲜人民共和国的一座村庄的年轻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的奋斗和梦想。从较表面的层次看，1986 年当超优首次进入美国小型轿车市场时，立即在日本、欧洲甚至美国本土的同类产品中异军突起。超优的一夜成名，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代表并强化了韩国经济成功的印象。韩国，至少是南韩，即大韩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业化时代。没有人会再将韩国列为“第三世界”国家了。

从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来看，韩国已步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虽然他也存在一些贫穷现象，这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尽管以中国商人为基础的台湾和新加坡也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地区，但相比之下，韩国的工业化水平还是要深入得多。至

于泰国，有时也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人们只要到泰国首都曼谷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的街道上看一看，就会知道其差异是多么巨大。从总体上看韩国也许根本无法与日本竞争，但至少它已在重工业制造业（如果不是外贸业）中首先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台湾的外贸在 1992 年猛然增加了将近 7%，达到了 815 亿美元，超过了韩国，成为世界上第 12 大出口国；位居十三的韩国出口总额为 766 亿美元，比 1991 年增加了 6.5%；新加坡位居第十五位，出口额达 636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7.8%。香港作为一个金融自由流通和轻工业制造中心，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但其经济的繁荣受到了中国大陆的影响，1997 年 7 月，经过 150 年的英国统治，香港将回归中国大陆）。

在谈到经济前景时，韩国领导人总保持低调，这与韩国长期受到日本统治与国家的分裂有必然的联系。1961 年 5 月 16 日，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事集团推翻前统治集团的理由之一便是这一统治集团太腐败了。1960 年 4 月学生骚乱中被迫下台的、受到美国支持的李承晚政权被证明没有能力将韩国经济从战后的动乱中解救出来。经过了青瓦台的长久酝酿，朴正熙推出了一套中央计划经济政策，对银行、外贸、内贸和生产进行严格的官僚控制。他的统治方式，除了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以外，在方式和行为上都让人想起希特勒时的德国或东条英机时的日本。

朴正熙于 1979 年 10 月 26 日被情报部门头目所刺杀。与朴同样独裁但更加腐败的继任者全斗焕将军得到了另一位将军卢泰愚的支持。他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前任领导人的哲学，并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他纳粹式的语调。无论是谁统治，所有工业集团的领导人都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正如纳粹德国的卡特尔和日本的财阀集团一样。日本的财阀理论上已被二战后麦克阿

瑟将军的占领军粉碎了。事实上，朝鲜文的“财阀”二字与中文是相同的，意指“财富团体”。与“Zaibatsu”一样，“财阀”一词虽然经常被使用，但含有贬义。郑周永在一次与来访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查尔默斯·约翰逊教授谈话中表示了他对这个词的不同意见，在这次由他任会长的韩国经济人联合会主持的各财阀首脑的座谈会中，郑要求约翰逊教授不要使用这个词。

促进经济增长就必然需要强硬的中央计划经济吗？或者说我们应将韩国经济异乎寻常的增长归功于以牺牲民主自由作为高昂付出吗？显然还存在其他的原因。如果没有决心将韩国制造成为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领导人的全面支持，财阀们不可能崛起。强硬的中央经济计划、拒受外来竞争以及对要求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的工人和激进分子的军事镇压——所有这一切都为财阀提供了一个温室的环境，使它们可以不受任何威胁和干扰，蓬勃发展。

有关财阀们的统计数字是极其惊人的。90年代初，据一家重要的外国证券公司的统计，韩国位居前十名的大财阀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7.3%，前50家大财阀则占到了97.4%。财阀家族的成员几乎占据了财阀公司中75%的总裁和经理董事职位。这家外国证券公司的统计报告还说，在所有61家财阀集团中，家族的财产占有率以及交叉占有率（一家公司中被另外公司占有股份）几乎达到了46.9%（韩国反垄断和公平交易法规定，固定资产超过4000亿韩元——相当于5亿美元的企业集团称为财阀）。要不是政府要求各财阀集团公布其交叉拥有的财产的财务表，这种比例控制早已超过50%。即使如此，据前财政部长司空一所说，到1992年4月，“前30家最大的集团中的46.1%的已缴付总资金的46.1%，都由一个主要持股者（通常是集团的创建人或其第二代继承人），他的

亲戚和其他财阀公司所占有”。据司空一批露，创建人在现代公司中所占份额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 65.6%——比其他任何财阀公司都大，三星公司是 58.3%；大宇公司是 48.8%；乐喜一金星公司是 39.7%。

在这种发展中，财阀与社会中的反财阀势力的斗争也不断激化。“财阀是今日韩国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司空一写道，“自 80 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财阀势力无限膨胀，对财富又贪得无厌，因此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抨击。”另一个研究报告如此说道：“各方抨击财阀，认为它们压低工资，剥削工人；压制劳工运动；与政治势力勾结谋求经济利益；并进行庞大的房地产投机活动。”事实上，“与政府分散国家资源集中趋势相背道而驰的”财阀势力正在逐渐增大。据韩国经济企划院称，到 1991 年，财阀的资产占了国内总资产的 45%。由于它们开始时的成功并不仅仅依赖政府的支持，现在，它们的行动就更加独立了。

打消财阀的势力，成为维护中小企业利益的经济工作者们的重要愿望。他们认为，各公司不处于一个平等的竞争水平上，用司空的话说，当“财阀急剧增长的资产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手中”，并且“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经济增长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时，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政府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呼吁各财团交叉占有的资产比率从目前的 40% 降到 1996 年的 20% 到 30%。但是，占有率下降多少才能削弱财团力量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据。“仅仅将股份卖出并不一定会减小它们的重要性，”汉城一位资深经纪人希恩·戈德里克说道，“它可以分散所有权，但却使股票价格大大降低。分散股权并不能使大财团有所收敛。”——特别是当一系列混乱不堪的法规出台后，限制财团势力的行动就变得更加不可能了。